

“以文化人”语义的学理澄清与实践意义

方黎^{1,2}

(1.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肥 230036)

摘要:在其原初的语义中,“以文化人”是封建帝王维护统治的重要策略,“文”主要指代礼乐典章、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化”侧重于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开化、教化与训从,“人”的落脚点是封建顺民,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统治、维系社会秩序、追求理想人格。在“以文化人”的当代语义中,“文”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以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为借鉴的先进文化,“化”表征为涵化、熏陶、引导等隐性教育方式,“人”的落脚点是时代新人。“以文化人”之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凝聚价值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

关键词:“以文化人”;语义;学理澄清;实践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2-0020-05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1]641}当“以文化人”作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的时候,对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进行语义的学理澄清,对传统社会语境与当代社会语境中“以文化人”的语义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以文化人”的语义,在对于历史做法的借鉴与扬弃中,更深刻地发挥着理解当下、辅成当下的现实意义。

一、“以文化人”的语义为何需要澄清

对于任何研究课题而言,针对关键概念的语义分析当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大之后,“以文化人”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这其中不乏有对“以文化人”的语义解读,但仍存在疏漏与模糊之处,不利于“以文化人”研究的深入推进。

(一)“以文化人”的语义缺乏纵向的比较分析

理论研究需要兼具抽丝剥茧的深刻性与回应现实的观照度。“以文化人”虽然是时代课题,但从词源的追溯上看,其语义古已有之,是中国传统育人智慧的体现。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在当

下社会语境中如何理解“以文化人”,其语义在古今演进中有无延续或差异之处,而既有研究中对于“以文化人”的语义界定多为平面化的分析,缺乏时空纵向分析的视角。深挖下去便会发现一系列问题:一是既然“以文化人”是传统智慧的结晶,那么它的原初语义到底是什么,当时的出场目的是什么,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其语义是否有所演进,所关联的目标指向是否有变化?二是在语义的理解方面,当代社会语境中如何对待“以文化人”的原初语义,是全盘吸收还是辩证扬弃等?三是从“以文化人”的学理澄清中可以得出哪些服务当下的实践启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关乎到对“以文化人”这一概念的科学把握,进而影响到实践践履。

(二)对“以文化人”的组成要素“文”“化”“人”的认知还不够明晰

正因“以文化人”是个古老的概念,反而容易使人们在理解把握中产生惰性,停滞于对“以文化人”的感性理解与浅表解读,影响了对其语义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把握。具体而言,我们不妨从“以文化人”的组成要素“文”“化”“人”的角度来看待语义澄清的必要性。

其一,以何“文”化人。“文”是“以文化人”

收稿日期:2020-02-25

基金项目:2019年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sztsjh 2019-08-28)

作者简介:方黎(1986—),女,安徽霍邱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的基本前提,它指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要确保有“文”可以用作“化”的资源;二是要选择拿什么“文”来“化人”。第一个问题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活极大丰富与文化传播手段网状铺设的环境中,可以迎刃而解,关键问题是拿什么“文”来化人。在时空高度压缩与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中,当代中国社会的“文”过于繁杂,在民族文化的内部存在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多样交织的张力,以及一元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杂样并存的压力;在民族文化与他者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全球化与全媒体时代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以及西方文化霸权等多重文化压力。既有研究中挖掘了各色的“化人”之“文”,诸如乡土文化、家书文化、仪式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等,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仔细推敲发现在对“文”的内容认知上还不够清晰,既然“文”有多种类别,就存在主次之分,就存在鉴别与筛选之分,我们需要在古今“以文化人”的语义与语境的比较中,进一步深刻把握“文”的内容。

其二,如何“化”人。“化”是“以文化人”的关键环节,文化的影响是自在自发的,需要经由“化”这一中介手段来引导文化在教育对象的身心中发挥出好的影响力。正因“化”的地位重要,我们才需要理解如何“化”,“化”不仅关联方式方法,还关联目标立场,目标立场不同,“化”的进路亦不同。既有研究中对“化”的理解多为一种先人为主式的手段方式的理解,我们还需要从“以文化人”语义的古今演进中,探寻当代社会语境中“化”的目标立场与基本性质,进而做出恰当的实践选择。

其三,化什么“人”。育人是“以文化人”的根本目标。古往今来,“以文化人”作为一种价值主张不仅承担了促进人成为文明人的任务,还担负着更深刻的政治使命,政治使命不同,对于“人”的培育目标亦不同。既有研究中虽然关注到了“人”在“以文化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人”的成长规律与教化规律等做了多样的研究,但是疏漏了时代对“人”的期许,需要结合“以文化人”的语义演变,参照其目标指向的具体内容,在原初语义与当代语义的对比分析中,界定“人”的时代语义,从而确保“以文化人”的落脚点稳且准。

二、“以文化人”的原初语义及其演进

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以文化人”的思想源远

流长,对其语义的学理澄明,需要一种比较分析后的论证。

(一)“以文化人”的原初语义

从《说文解字》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文”的本义通纹理,“文,错画也,象交文”^{[2]1},后引申为语言文字等象形符号、文书、制度、装饰、修养、德性等意义,寓意着美和善。“化”的本义通生成、改变、造化,如“化而为鸟,其名曰鹏”^{[3]3-4},指改变事物的形态与性质,后发展为对人的教行迁善。《周易·贲卦·彖传》中较早出现“文”与“化”的联用:“刚柔相济,天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158-159} 这其中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2]2}。治国者通过“人文”来实现“化成天下”的目的。汉代刘向较早将“文”与“化”结合表述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5]1037},这其中,“文化”意指文治教化,“文”是名词,“化”是动词,与“以文化人”的语义近似。之后古文典籍中经常出现的“文化”一词,基本上都蕴含了“以文化人”的语义。

如何“以文化人”,当从封建大一统的指导思想儒家学派的理论中探寻要义,儒家极为推崇“仁”与“礼”,其创始人孔子将“仁”视为人所应该追求的内在品质,这从《论语》中“仁”的高频出现可见一斑。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6]205},“刚、毅、木、讷,近仁”^{[6]201},而仁者应该推己及人去宽厚待人,对于君王而言,仁爱惠民,以德化民则为善政的最高境界。同时,孔子将“礼”视为人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这里的“礼”指代礼节仪式,孔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6]259},“道之以德,齐之以礼”^{[6]13}。在孔子的视域中,“以文化人”就是围绕“仁”与“礼”而展开的,所以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6]171}。在孔子之后,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发展了儒家“仁”的学说,有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7]261}。孟子认为人对于“仁、义、礼、智”的“四端”存有先天性的善念,与生俱来就心有恻隐、知羞恶、懂辞让、明是非,至于君臣、父子等关系,则属于天命赋予的伦理纲常,“仁之于父子也,义之

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畏命也”^{[7]263}。但即便如此,要达到天命要求的伦理关系仍需不断加强自我修养,保持并发展善的天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7]234}。主张性恶论的荀子着重发展了儒家“礼”的主张,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8]513},要想化恶为善,需充分发挥环境和教化的力量。荀子强调王霸,主张兼用礼与法来矫正、教化民众,有言:“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8]434}孔孟荀的思想奠定了封建社会“以文化人”的思想根脉。

传统社会中的“文”主要指代礼乐典章、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化”侧重于统治阶级对于民众的开化、教化与驯化,《管子·七法》中“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的表述颇能表达这种意蕴;至于“人”的落脚点,则指代为服从君王之治的顺民,儒家对于人的道德教化所希冀的理想境界是“尽伦”,儒家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纳为宗法关系予以强调,无论朝代更迭还是机构改制,君臣、尊卑、上下、亲疏等等级秩序不可紊乱。

“以文化人”的原初语义指涉三个目的:一是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汉武帝时期,陆贾在对盛极一时的秦王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剖析后,认为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最好方式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9]2692},要充分发挥“礼乐教化”的影响,用“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宗法观念约束民众,化民成俗。至此,中国进入德主刑辅的封建统治时期,“以文化人”作为维护帝王统治的策略受到认可,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二是维系社会秩序。儒家认为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是等级间的和谐,这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对普通民众而言,需要以一种封建道德规范来将民众联结起来,使其成为顺民,转移等级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三是追求理想人格。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理想人格的塑造,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以文化人”中“文”的重要选择,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体现为“内圣”与“外王”。“内圣”指代一种向善的德性修养与对“知”的追求,这里的“知”意指一种理性

的品格;“外王”彰显出强烈的责任感与家国情怀,追求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人世功劳,但封建社会对于“内圣”与“外王”追求的前提是“尽伦”,限制了理想人格的价值立场。

(二)“以文化人”的当代语义

近现代以来,虽然以儒家为首的传统文化受到质疑与批判,但重视文化的传统并未中断,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育人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中国成立初,我党继承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曲折探索中的经验教训,结合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视文化影响力的治国方略,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向成熟,为“以文化人”赋予了新的语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强调要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2013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10]580}、“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10]583}、“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10]585}。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之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以文化人”等发挥文化育人功效的关键词都被多次提及。

在当代语境中,“以文化人”指涉以先进文化为介质,通过文化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来影响人、感化人,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推动人的精神成长,进而外化出积极的实践力量。关涉新的目标指向: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而言,在完成物质文明的基础建设之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壮大越来越需要共同精神价值的凝聚与激励,这便是文化的意义,文化成就了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昌明的精神基础。从国家间的交往而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带来文化格局的转换,中国智慧的世界认同度走高,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二是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运用文化的力量提高治国理政的

水平,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现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现。三是凝聚价值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文化的核心要义是价值观,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相伴而生,意识形态关联政权的存亡与民族的盛衰,面对繁杂的文化生态,要引导民众做出恰当的文化选择,在文化认同中凝聚价值共识,把牢意识形态的导向。四是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社会的文明不仅体现为物质文明的丰盛更表征为精神世界的充盈。一方面文化表征建构起人的精神世界,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在于其生物属性,更在于其作为人的类属性,这其中文化所勾勒出的价值取向、意义体系、人文精神等特质赋予了人独特的文化性存在方式;另一方面文化在优化人的存在方式的同时,通过对人本质力量的提升、内心世界的涵养等多种方式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动力,进而持续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三、澄明“以文化人”语义的实践意义

学术研究是理论研究,理论必须要为实践服务,对“以文化人”语义的学理澄明,需要一种比较分析后的实践取向,这其中既存在继承与延续的意义,又存在反思与扬弃的启示。

(一)从原初维度观之,“以文化人”的语义需要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

在原初语义中,“以文化人”已经显现用文化来开化、教化、驯化人的意蕴,它的出场指涉文化对人对人行为的影响,原初语境中对于文化的珍视,对于人的道德感化与礼仪规范的强调,以及反对不教而诛的系列思想有积极意义。在当代,在发达工业文明中,人们在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商品经济的丰盛诱惑下,面临着技术的单向度崇拜与消费意识形态膨胀的危机,人在对于技术与商品的追逐中一度面临物化的危机,一系列为了满足特定的社会利益,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而非主体需求的虚假性的需要被附加在主体身上,由此,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倒退,在更加富裕、更加民主的现代文明社会中,人反而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被新的工具理性奴役,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一个人文精神亟待充盈的时代。所以,原初语境中,“以文化人”所指涉的用文化来影响人的语义是值得继承的。

然而,更深一步进行语义剖析便会发现,对原初语境中“以文化人”的语义继承是一种批判性

继承,需要发展和扬弃。原初语境中的“文”指代的是封建礼乐典章、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封闭且等级意识明显,这不符合当代语境。文化属于结合知识,在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它是因变量,一定的文化受制于一定的经济与政治状态,并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文”应当具有先进性,这一先进性涉及到三个关键点:一是“文”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是积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原初语境中的“化”更多指涉矫正与驯化的目的,带有强烈的等级色彩与尊卑意识,而当代语境中的“化”应为涵化、熏陶、引导等隐性教育方式,胜在润物无声,其中既要提倡教育者的主动作为,又要提倡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与主体间的平等。原初语境中的“人”典型地表现为认同封建等级统治的顺民,是被统治的对象,而当代语境中的“人”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当代“以文化人”在“人”的落脚点应当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从当代维度观之,“以文化人”的目标立场经历了借鉴与扬弃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当代社会,在“以文化人”的目标取向上都极为重视文化对于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维护方面的作用,古代中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华夏礼仪之邦的形象,这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葛兰西就曾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并认为政治领导权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1]38}这其中“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便是文化领导权。事实上,随着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前移,民众的文化生活与价值认同之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意义愈发显现,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个体人格塑造、素质提升的角度来看,原初语义中“以文化人”的目标取向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然而,原初语义中“以文化人”的立场方面却属于需要扬弃的部分,纵然由古至今,“以文化人”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但传统社会“以文化人”的立场是封建统治阶级,民众是单向的受众,开化民众与愚民政策并行,普通民众接受系统教育的几率低、代价高,教育场是赤裸裸的等级

场,服务于少数官宦子弟、富有阶层,导致绝大多数的民众无法获取均等的文化资本,其智识水平也难以得到充分提高,“以文化人”在民众的素养提高与人格塑造实现方面带有强烈的空想色彩。这种狭隘的等级立场显然不适合当代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文化人”的实践应坚守坚定的人民立场,这涵盖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尊重人民的文化权利,重视人民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均等权,让人民获得参与并构建文化场域的权利。另一方面在文化权利获取中,实现人民的文化话语权,让文化在“化”人的过程中,同时成为人民意志与生活的表达介质。也就是说,不仅在“化人”的过程中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文化的选择与发展过程中还强调人民对于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就实践立场而言,当代语境中的“文”是人民实践所得的成果,并且在人民的参与中得到丰富发展;“化”是服务于人民精神发展的一种手段;化“人”是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尊重与推动。

(三)从未来维度观之,“以文化人”的有效落实需要新的时代使命感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在实践操作层面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指向人深层次的思想提升与精神成长。它作为一种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当代与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承担起价值引领的时代使命,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在方式方法层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挖掘了诸种文化类型的“文”的资源,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备受重视;探索了多样的“化”人途径与媒介,尤其强调了“以文化人”与宣传思想工作的融入同构以及对于网络媒介的运用;关注“化”的环境构建,如家庭教养、学校培育、社会影响等环境因素;另外,一批高校文化育人的实证分析与案例分享也成为学者们探寻在“以文化人”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式方法的一种取向。

在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肯定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看到,与传统社会百姓主体意识式微,文化话语权缺乏的状况不同的是,在当代社会,一方面是大众的主体意识强烈,价值取向多元化;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信息源过于复杂,由前工业文明的单一中心传播模式变为如今的多点多中心传播模式,

文化来源便捷且繁杂。这就使得“以文化人”的任务更加艰巨,而且,文化本身就存在个体与群体间的矛盾与张力,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凝结而成的文化具有类的群体性特征,但是对于单独的主体而言,又有一定的约束性甚至强制性,这种矛盾与张力经由现代文明自由意识与技术应用的发酵尤为凸显。所以,在这一系列挑战面前,面对“以文化人”这一重要的时代课题,我们既要善于继承历史的宝贵遗产,又要能够结合形势变化,予以发展创新,让先进的文化发挥出好的育人价值,这迫切需要我们以发展性的眼光持续不断的努力,在“文”的方面,更好地予以阐释、编码,便于人民顺利地解码与认同;在“化”的方面需要围绕“以文化人”的当代语义及其目标指向,选择并丰富方式方法,发挥出文化“场”的影响力;在化的对象“人”的落脚点上,需要将“化人”与“育人”相结合,不仅要把握对象的思想规律与成长轨迹,还要围绕育人的目标使命来实现文化涵化中的价值引领。

“以文化人”这一命题有三个核心部分,用什么样的“文”,如何“化”,化怎样的“人”。本文只是从语义澄明的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剖析,对于“文”“化”“人”的深层次分析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张岱年,方克力.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3] 郭庆藩.庄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4] 李春青.中华古文论释林:北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5] 刘向.说苑[M].北京:中国书店,1991.
- [6] 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7]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8]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1] 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下转第31页)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Chine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From Dichotomy to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YUAN Jiulin

(School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society,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has changed. They have no longer regarded nature as the domin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origin of value. Instead, they regard it as the objective law and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can be controlled and used. The result is the value separation of 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 of nature and man, and man has become the value subject without restraint. The value system of dichotomy of nature and man brings about the social crux, such as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crisis of value and ecology of modern society. Therefore, the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should be rebuilt.

Key words: na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dichotomy of nature and man

(责任编辑 雪 箫)



(上接第24页)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emantics of "Moulding People with Culture"

FANG Li^{1,2}

(1.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In its original semantics, "moulding people with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the feudal emperor to maintain the rule. "culture" mainly refers to the ideology of feudal society such as ritual and music institution, ethical code, moral norm, "moulding" emphasizes the ruling class civilizing, educating and guiding the masses, and the foothold of "people" is the feudal abjectly obedient citizens. The purpose of moulding people with culture is to consolidate the feudal rule, maintain the social order, and pursue the ideal person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semantics of "moulding people with culture", "culture" refers to the advanced culture which is guided by Marxist theory, is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ses all the excellent cultures of mankind for reference. "moulding"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mplicit education way such as acculturation, edification and guidance, and the foothold of "people" is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times. The purpose of moulding people with culture is to build a country with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reach the value consensus, maintain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improve the people's cultural literacy.

Key words: "moulding people with culture"; semantics;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雪 箫)